

■哲学·政治·法学研究

延安精神的历史内涵与当代启示

杨彩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陕西省核心价值观培育与红色文化基因传承协同创新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精神;延安严酷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共产党崇高的理想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攻坚战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延安精神,培养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忧患意识,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关键词:延安精神;内涵;启示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06—0104—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j.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06.024

On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Yana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YANG Cai-juan

(*Politic & Economy Department, Shaanxi Xueqi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core values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theme of Anti-Japanese national salvation determined that the Yanan spirit is a kind of sense of crisis. The harsh living environment of Yanan determined that the spirit of Yanan is a spirit of self-reliance and hard work. The lofty ideal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etermined that the spirit of Yanan is a spirit of serving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 Today, we must carry forward the Yanan spirit, cultivate the sense of crisis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adhere to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establish the spirit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Yanan; connotation; enlightenment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队伍在祖国危难时期,在严酷环境下形成的以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等为内容的精神。只有历史地具体地解读延安精神的内涵,才有利于这一伟大精神在当下的有效传承。

一、抗日救亡时代主题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精神

1935—1948年被称为延安十三年,八年抗战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阶段,延安精神正是形成于这一时期。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

收稿日期:2016—10—12;**修回日期:**2017—01—05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面向“十三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6)

作者简介:杨彩娟,女,陕西岐山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陕西省核心价值观培育与红色文化基因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经历了国民党长达一年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千辛万苦,付出惨重代价,于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落脚陕北。到陕北后,中国共产党除继续与国民党的追剿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外,还不断反思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调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扩大革命队伍,并成功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终实现联蒋抗日的伟大转变,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展开对日斗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政治上,加快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采用三三制原则;在经济上,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度过难关;在思想上,发动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展开与错误思想和路线的斗争,提高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确立党的指导思想;在军事上,除了前线积极抗战,还成功瓦解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摩擦事件,维护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自1935年以后,抗日救亡是延安十三年特别是抗战八年时期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时代主题。因此,抗日救亡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心,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捍卫国家利益不懈努力的继续。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屡屡略我城池,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奋起反抗,书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救亡图存的民族史诗。但遗憾的是,这些抗争相继以失败而告终。华北事变后,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具体化为抗日救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继承前辈未竟的事业,抱着必死的信念,展开了保家卫国的神圣事业。延安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抗日救亡这一伟大时代主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延安精神首要的内涵就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一种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和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主题,我们有很多的发展机遇,但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新的危机。当下我们面临的主要危机有党的执政

危机,以经济金融为特征的隐性的民族危机,因环境恶化而带来的生存危机,因信仰缺失而导致民族精神无法凝聚的危机,因就医上学住房找工作难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等等,其中尤以党的执政危机最为迫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我们似乎进入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于是,我们的一部分领导干部,思想上开始麻痹不再居安思危,行动上开始懈怠无所作为,工作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生活上享乐主义、奢靡主义盛行,腐败大案要案触目惊心,党群关系日益紧张,社会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积累。所以发扬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等,首要的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员干部中展开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教育。我们要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提高作为执政党的警觉性,防患于未然。

二、延安严酷生活环境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是以西安为核心的中原政治的天然屏障、军事要冲和边防重地。历代王朝都曾派兵经略过这块土地,但统治者大多看重的是陕北的军事地位,对其经济上的开发并不充分。加之陕北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地带,基本地貌类型为黄土塬、梁、峁、沟等,不利于农业生产。在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这里的生产力比较低下,文化经济发展非常迟缓,产出严重不足,人口稀少,即使是延安,也只是一个三千人左右的边塞小城。陕北老乡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丁”的艰苦生活。另外,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这里的人们生活非常原始、卫生条件比较差、识字率很低、文化观念相当落后。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移师陕北后,以丁玲为先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海外侨胞,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延安。“延安距西安300英里,每天都有人越过秘密警察和封锁部队的交叉火力,告别亲人,踏上通往延安的危险旅

途,因为那里蕴育着未来”^{[1]360}。据统计,从1937年到1939年奔赴延安及其它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达数万人。仅在1938年5月到8月,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之多^{[2]17-18},延安一时间成了“年轻的圣城”^{[3]223}。

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使得小小的延安城,到1938年底时,其人口一下子猛增到近三万,到四十年代初,光延安城的知识分子就达到四万多人口^{[4]279}。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给贫穷落后的陕北带来了文化上的冲击,也使得这里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加艰难,住窑洞,吃小米,穿粗衣,点油灯,还有那捉不完的抗日虫。这种本就入不敷出的艰苦而原始的生活,从1938年起,由于日军对延安的空中轰炸,国民党政府对延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以及1940年特大水灾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边区政府党政军民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发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发表了《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要求各解放区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5]。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讲话,他说:“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6]108}。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7]892}的方针。

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歌曲《二月里来》、《生产大合唱》、《南泥湾》等都反映了当时大生产运动的艰苦奋斗景象。王震将军率领八路军120师359旅,在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他们用惊人的毅力,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开荒35万多亩,不仅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而且还向边区政府上缴了1万石公粮。边区政府党政军干部更是身体力行,亲自开垦,纺纱织布。通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于度过难关,不仅实现了自给,也保障了前线战争的需要。正如范斯莱克指出的:“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

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技术的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8]684}。毛泽东并为影片《南泥湾》的拍摄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6]420}。

陕甘宁边区军民开展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凯歌。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边区军民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革命精神。

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使我们摆脱了延安当年的那种生存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辉煌成就,也使我们不再有六七十年代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大穿了老二穿的艰难岁月。但在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不容忽视的是,我们的一部分干部,在生活作风上逐渐滋生了一股骄奢之风、摆阔之风以及攀比之风;在实际业务上急功近利,追求面子工程,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在接待上,讲排场、比阔气,超规格。这些现象和做法,导致了国家和社会财富的严重浪费,与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相径庭,也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

我们不能忘记古人的教诲:一米一粟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惟艰。当下的反腐倡廉工作的核心就是要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场上的奢靡主义和享乐主义,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9]422}。艰苦奋斗与廉洁奉公和厉行节约是高度一致的。

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宝贵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同延安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也不可否认,艰苦奋斗精神,在困难时期,在逆境中,在危局时,容易得到发扬光大;在富足时,在顺境中,在和平时比较难保持。但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目前,发扬艰苦奋斗,落到实处,就是我们要在全社会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攀比挥霍,我们要厉行勤俭节约,既不寒酸,也不奢侈。我们的党员干部

要廉洁奉公,厉行节约,艰苦奋斗;我们的人民群众要量入为出,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如果我们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善我们的生活,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吃苦受罪的革命斗争将会失去现实意义;但如果我们不厉行节约、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可能会面临新的困境。历史经表明,坚持艰苦奋斗则兴,丢掉艰苦奋斗则衰。

三、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

自古以来,人类基于对现实生存状况的不满,不乏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至圣先师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曾提出了大同的理念。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与孔子同为轴心时代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最先提出了“共产”的概念。到了近代早期的莫尔、康帕内拉、安德里亚等则采取虚幻浪漫主义的文学游记形式,表达了他们对理想社会的探索和追求,表现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继承莫尔等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以政论文的方式,明确而直接地把斗争的矛盾指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社会矛盾的弊病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大胆地提出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集欧洲自古以来先贤对理想社会规划之大成,并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提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号召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当为实现一个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全民共有,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别消失,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人类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人类将在公民自治的范式下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而奋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以来我国一代代仁人志士不同的救国救民道路,在比较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发展理念和道路的过程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了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不仅仅是西方知识分子对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各种期盼模式的集大成,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关未来社会大同理念的构想。因此,毛泽东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接受共

产主义理念,他们就决心为之而努力奋斗,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延安时期,正是这样一群怀揣理想,怀揣梦想的共产主义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延河边宝塔下,在陕北的沟沟坎坎和窑洞里,以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和精神,谱写了一部气势恢弘的革命史诗和生存画册。在他们艰难的生存和革命斗争中,凝聚了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舍我其谁”、“铁肩担道义”的积极入世的责任意识;凝聚了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凝聚了一种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反思和修正的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实践中,具体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具体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延安精神就是一种心存高远、怀揣梦想、胸怀天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种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是要像我们的革命前辈一样,有理想、有追求,有梦想,有担当。2013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发展决定了延安精神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好,革命和建设工作开展得就会相对顺利一些;这一问题得不到适当的解决,革命和建设往往就会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发展中,在一次次惨痛的教训中逐步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着手建立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发动国民革命,进行北伐,打倒军阀除列强。就在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紧接着汪精卫进行“七·一五”分共,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势力遭到严重破坏,革命陷入低谷。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自身力量较弱、经验不足外,主要原因是遥控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在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现场实际的情况下,犯了瞎指挥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结果。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革命群众,发动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一次次反围剿斗争,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等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但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一直存在着实战派和来自苏派中央之间不同路线的分歧。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也在理论上最先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展开了与教条主义的斗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遭受了第二次重创。在移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此后展开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是第一次正式严肃地解决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的路线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实践表明,只有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地做到不唯上,不唯本本,才能做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战的今天,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首选必须解放

思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其次,必须坚持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的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才能把握事物的根本规律,才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最主要的内容和最根本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第四,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思想路线根本对立的又一重要表现。第五,要反对主观主义,特别要反对一切从书本出发的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树立优良的学风。总之,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积极面对一切挑战和困难,不忘初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 [1] 韩素音. 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 [2] 王云凤. 延安大学校史[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3] 何其芳. 何其芳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4]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社论. 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N]. 新中华报,1938—12—20.
- [6] 逢先知. 毛泽东年谱(中卷)[M].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范斯莱克.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9] 逢先知. 毛泽东年谱(上卷)[M].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学术编辑 黄彦震]

[责任编辑 雷润玲]